

佛教教育在现代印度的复兴概况

印度巴那勒斯大学 罗尔吉

1. 古印度的佛教教育
2. 中世纪印度佛教教育的消失
3. 佛教在现代印度的复兴
 - 3.1 佛教复兴的先锋者
 - 3.2 寺院的建造
 - 3.3 学术研究的开展
 - 3.4 社会觉醒运动
 - 3.5 教育机构的成立
 - 3.6 内观禅修的复兴
4. 佛教与现代教育

1. 古印度的佛教教育

印度的教育历史源远流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机构。公元前约一千年之前，家庭是唯一的教育机构：在孩童学习阶段，根据其所需，教导他们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技巧；到了青年阶段，为了适应社会制度的发展和生存需要，家庭以口传和实用教育方式，教会他们家庭事业的经营技巧^①。公元前一千年之后，印度社会建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教师负起教育儿童的责任，学校(Gurukula)制度因而兴起^②。当时，学校教育开设伦理道德、天文、兵法和宗教知识等课程。然而，当时社会只允许精英阶级，包括统治者、行政人员、士兵和祭师的儿子等接受学校教育，其它阶级的人们是无法到学校接受教育。

随着佛教僧团的兴起，社会建立另一种教育系统——僧侣教育。僧团负起指导新受戒的僧侣关于戒律和佛陀教义的责任，因此寺院成为佛教的教育机构，开设戒律、佛经和其它学科等课程。然而，在小乘佛教时期，寺院僧团只教导僧侣应该具备的佛教知识和能力，对于大众教育毫无兴趣。到了大乘佛教时期，寺院的教育性质发生变化，教育对象不再限于僧侣，也包括一般大众。当时有些寺院，像那烂陀寺(Nālandā)、伐拉比寺(Valabhī)等都为僧侣和大众安排高级佛教课

^①Alteker, A. *Education in Ancient India*. Varanasi: Manohar Prakashan, 1975: 36,73

^②Sharan, B. *The Gurukula System of Education in India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odern Times*. Varanasi: Sarala Press, 1968: 70-71

程，这些寺院也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寺院大学”的美誉，吸引众多印度和外国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前来学习。当时，在社会上，这些寺院教育机构不遗余力地推广和赞助佛教、佛教哲学和印度文化方面等活动；在学校方面，也安排佛教哲学和其它学派思想的课程，并加强各派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最后形成了正理哲学。

2. 中世纪印度佛教的消失

佛陀成道之后，开始传授他所获得的正知和解脱之道，也就是佛法，又称为“佛教”。佛教先在印度发展和兴盛，然后传到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东亚，并受到印度和外国统治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由于阿育王致力于宣扬佛教，派遣许多护法使者（Dhammadūtas）到亚洲各角落传播佛陀教义，佛教成为南亚和东南亚多数地区的宗教。阿育王之后的迦腻色迦（Kaniska）皇帝也全力支持和宣扬佛教。佛教在当时是各国教育的重要学科，不仅在世界各处掀起新思潮、建立新教派和新学派，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佛教相关的活动。到了笈多王朝，佛教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同时也是一门哲学。因此，这个王朝见证关于佛教寺院教育的成长：那烂陀寺、超戒寺（Vikramaśilā）、伐拉比寺（Valabhī）、闍迦达拉寺（Jagaddala）等一个接一个地成立，它们都成为佛教和印度文化思想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闻名于世界。然而，由于种种因素，佛教逐渐从印度消失。

原本在寺院教育鼎盛时期，僧侣们教育信徒关于佛陀教义、解决他们内心疑惑，以及为他们执行人生仪式，信徒们也习惯到寺院聆听佛法和练习禅修来寻求解脱。当穆斯林入侵印度之后，他们竭力抹灭所有佛教痕迹，其中又以奇拉吉（Bakhtiyāra khilajī）最具代表。当他在公元1197年毁灭那烂陀寺后，印度佛教僧侣不是遭到屠杀、逃离印度，就是转入地下，尤其是当那烂陀寺图书馆遭受摧毁后，连佛教的一手教义都无法再取得。因为黄袍僧侣的消失，无人可以教授佛教教义，禅修也因而停止，渐渐地印度本土不再有真正的佛教徒。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象征佛教的寺院被外国人（穆斯林）摧毁而荒凉，许多重要寺院也被把佛陀视为毗湿奴化身的毗湿奴教徒和湿婆信奉者占领。

原本在佛教鼎盛时期，社会上所有的佛教活动都由寺院所掌控。当寺院毁坏和僧侣消失后，僧团对佛教的控制也随之结束，佛教徒从此失去他们的精神、文化和生活领袖。综合上述的历史事件，对于佛教在印度的消失的原因，除了穆斯林毁佛的外来因素之外，我认为还有三个佛教的内部原因：（一）虽然佛陀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但是他没有为社会提供另一套可行、可替代的健全系统，导致印度人民仍然遵循婆罗门教的社会传统，而非佛陀的想法。（二）婆罗门教有许多传统、人生仪式和祭祀来识别信徒，但是佛教几乎没有这些；加上婆罗门教的信徒把执行传统和祭祀视为是个人义务，但是佛教毫无这方面的描述和要求。所以，有些佛教徒在没有其它选择下，只好让婆罗门祭司来执行人生仪式或祭祀等。（三）佛陀的教导主要是针对离开家庭、放弃世俗生活的僧侣，并非针对在家信众，所以佛教几乎没有针对在家信众所写的经典或指导守

则，因此信众只有念诵一或两个像《善生经》（*Sigālovādasutta*）的基础经典来遵从佛陀的教诲。

佛陀是一位精神导师，他想让每位有情众生免于一切苦。但是，他不是以赐福和赏赐奇迹来让众生免于苦，而是希望每位众生能够使用自身内在的光来解脱苦^①。他为众生指出一条明路，并建议想要摆脱苦的人遵循这条明路，这条明路清楚地写在《转法轮经》（*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中^②。但是佛教毕竟不是一个具有神学观念的宗教。所以当僧团不再有领导权、寺院被毁坏和占用后，佛教徒失去了机构支持而离开佛教。虽然还有一些在家信徒延续了佛教传统的生活制度，但是与印度教徒相比，佛教徒并没有独立的识别身份。对于这个情形，伽尸耶瑟法师（*Bhikkhu Jagadish Kashyap*）描述佛教和印度教的情况：

“我们可以把佛教比喻成一座城市的大电厂：当它运作时，能够让强大明亮的灯泡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当受到侵略者的轰炸，电厂不再提供电力，整个城市陷于黑暗。”

“另一方面，婆罗门教可以比作村里房子的老式燃灯，彼此独立。虽然它们的光是暗淡和微弱的，但是任何人都可能同时吹熄所有的灯，让村庄陷于黑暗。^③”

3. 佛教在现代印度的复兴

3.1 佛教复兴的先锋者

几世纪以来（第十二至二十世纪初期），佛教消失于印度心脏地带，却持续活动于周边地区。公元十九世纪开始，因为许多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僧侣和佛教徒的努力，佛教在印度开启了复兴大门。此外，西方学者对于佛教的复兴也功不可没。他们在进行印度学研究和遗址发掘时，发现大量佛教文献和遗址，因此吸引许多东方学学者前来印度从事相关研究，让已埋在地下的佛教再次以具体建筑和义理思想两种形式出现于世人面前。在此，我们将关注领导佛教复兴的几位重要先锋。

印度一位名叫阿马尔·辛格（*Amar Singh*）的年轻人，他是比哈尔省伽格蒂斯浦尔（*Jagadishpur*）地区首长昆瓦尔·辛格（*Kunwar Singh*）的兄弟。阿马尔不但是第一批参加印度独立运动的英雄，也是积极参与佛教复兴的一位先锋^④。1857年，印度独立运动失败后，阿马尔逃至斯里兰卡的一座寺院避难。在1890年，他根据斯里兰卡的佛教传统，在那耶克法师（*Indrasabha Nayaka*）座下受戒为比丘，法号大雄（*Bhikkhu Mahavira*）。他先在斯里兰卡学习巴利语和佛教义理，然后再到缅甸接受佛教禅修训练。公元1891年，他从缅甸回到印度，定居于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迦（*Kushinagar*），并在那儿成立了现代印度第一个宣扬佛教的组织。这是佛教复兴的第一道曙光。

^①Cf. ... *attadīpā viharatha attasaraṇā anaññasaraṇā Dīgha Nikāya*, II. 80; *Samyutta Nikāya*, III. 274-75

^②*Mahāvagga (Vinaya Piṭaka)*

^③The *In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1996: 76

^④The *In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1996:76-77

第二道曙光照亮于公元 1891 年。斯里兰卡籍的达摩波罗法师 (Anagarik Dhammapala) 从斯里兰卡科伦坡来到印度，在同年 1 月 22 日到菩提伽耶 (Bodha Gaya) 朝圣。当他 5 月回到斯里兰卡后，立刻在 31 日成立“菩提伽耶摩诃菩提协会” (Buddha Gaya Maha-Bodhi Society)。这个协会的总部设立在科伦坡的智增学院 (Vidyodaya Parivena)。学院的大和尚，也就是达摩波罗法师的精神导师苏曼伽罗比丘 (Hikkaduwe Siri Sumangala Nayaka)，为协会第一位终身主席。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出版佛教的英文和印度语文献、建立佛教寺院、成立佛学院，以及收回菩提伽耶寺院的管理权。他也在印度各地成立摩诃菩提协会分会来宣扬佛教。根据协会宗旨，他在公元 1892 年 5 月开始发行《摩诃菩提期刊》 (Maha Bodhi Journal)。在达摩波罗法师不幸圆寂之后，他的弟子钵哩狮法师 (Bhadant Devapriya Valisinha) 继承遗命，负起复兴印度佛教的神圣使命。沙萨梨法师 (Bhadant Sasanasi)、胜宝法师 (Bhadant Jinaratana)、法宝法师 (Bhadant. U. Dhammaratana) 和僧宝法师 (Bhadant Sangharatna) 等致力于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务。

第三道曙光则是来自于孟加拉吉大港 (Chittagong) 尤尼普那 (Uninepura) 的拘帕萨罗难法师 (Ven. Kripasarana)。他在公元 1881 年的孟加拉历卫塞月 (Vesākha) 1 号，也就是在 16 岁时，从尤尼普那寺 (Uninepura Vihāra) 住持善财月大和尚 (Sudhanachandra Mahāthero) 的座下受沙弥戒。在 1885 年 20 岁时，他由富罗那遮罗法师 (Punṇācāra) 受戒成为比丘。次年，他随着富罗那遮罗法师到印度佛教圣地朝圣，让他打开了对佛教的视野，从此，他献身于印度的佛教复兴，并把加尔各答当作活动的中心。首先，他把居住于加尔各答的佛教徒组织起来，在 1892 年 10 月 5 日成立“孟加拉佛教协会” (Bauddha Dharmānkura Sabhā)。自 1908 年起，他开始发行孟加拉语的佛教杂志《世界之光》 (Jagajjyoti)，杂志编辑为德庄严大和尚 (Guṇālaṅkāra Mahāthera) 和全乐 (Swāmī Purṇānanda)。隔年，拘帕萨罗难法师建立一座名为“德庄严” (Guṇālaṅkāra) 的图书馆。

公元 1907 年，拘帕萨罗难法师在印度锡玛拉 (Simla) 和勒克瑙 (Lucknow)、1908 年在迪布鲁格尔 (Dibrugarha)、1915 年在拉奇 (Rachi)、1918 年在锡隆 (Shilong)、1919 年在大吉岭 (Darjiling)，以及 1922 年在达塔城扎马舍达普尔 (Tata Nagar Jamashedapur) 等地成立孟加拉佛教协会分支机构，唤起印度大众对于佛法的兴趣。他也非常关注佛教与社会问题：公元 1910 年，他召开了青年佛教会议，主要讨论学生问题；为了关注女性议题，他于 1918 年主办佛教妇女大会。

在穆克吉 (Asutosh Mookerjee) 的协助下，拘帕萨罗难法师是印度第一位在加尔各答大学 (Calcutta University) 开设巴利语课程的人。而且，在他努力奔走之下，英国政府批准了印度公民到英国大学从事巴利语研究的奖学金名额。1914 年，巴鲁阿 (Beni Madhab Barua) 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人，他选择到伦敦大学进修巴利语。公元 1924 年，拘帕萨罗难法师举办了现代印度的首次僧侣剃度法会，在法会上，他剃度了许多比丘。这是现代印度佛教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大事。他的一切努力不仅为印度的佛教复兴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也加强了复兴活动的活

跃性^①。

来自缅甸的月宝法师也为印度的佛教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 1891 年，达摩波罗法师和奥尔科特上校 (Colonel Olcott) 参观缅甸，拜访了当时著名的僧底玛罗摩寺 (Sandimarama Temple) 的僧底玛罗法师 (Saradaw U. Sandimar) 和他的两位新信徒修月 (Shin Chandra) 和修都利耶 (Shin Thuriya)。达摩波罗法师请求僧底玛罗法师派送这两位新信徒到印度，打理摩诃菩提寺的事务。缅甸历 1252 年，这两位新信徒来到了印度。其中，修月后来成为著名的月宝大和尚 (Sri Bhadanta U. Chandramani Mahathera)，他就是 1956 年安贝德卡 (Baba Saheb Bhimrao Ambedkar) 皈依大会的首席法师^②。

达斯 (Pandita Ayodhya Das) 是佛教复兴的活跃分子之一，也是南印度不可碰触的贱民阶级的领导者。他在公元 1898 年皈依佛教，也是第一位南印度的佛教徒。1900 年，他在清奈 (Madras) 成立“南印度佛教协会” (South India Buddhist Association)。为了宣传佛教，他编辑了泰米尔周报《泰米尔人》 (Tamilian)。

觉乐法师 (Bhadant Bodhananda) 是现代印度著名的僧侣之一，也在佛教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于公元 1914 年 10 月 4 日在拘帕萨罗难法师和德庄严法师的座下受戒为比丘，是第一位在现代印度本土受戒的法师。觉乐法师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北方邦 (Uttar Pradesh) 的首都勒克瑙。1916 年，他在勒克瑙创立“印度佛教协会” (Indian Buddhist Society)。为了改革印度社会、关注社会经济问题，他也成立了“新宝协会” (Nava Ratana Samiti)，又称为“落后阶级联盟” (Backward Classes League)。

除了上述几位先锋，在二十世纪 30、40 年代，印度的佛教复兴主要由两大团体主导：一是由罗怙罗法师 (Rahul Sankrityayan)、俱萨阎衍法师 (Bhadant Ananda Kausalyayan)、伽尸耶瑟法师和安贝德卡为首的团体；另一则是由达摩波罗法师、缅甸僧人、开明的印度教徒，以及灵智会 (Theosophy) 的下属机构等团体所主导。

3.2 佛寺的建造

在佛教初始和鼎盛时期，佛教寺院主要负责宣传佛教和提供佛教教育的机构。当印度开始佛教复兴和佛教学术活动时，也同样需要佛教寺院来执行。1891 年，当大雄比丘从斯里兰卡回到印度时，就已经深刻体会到寺院的需求。1901 年，他在拘尸那迦为朝圣者建立修道院；次年，他建造了现代印度的第一座佛寺——佛陀寺 (Buddha Vihāra)。

公元 1902 年，缅甸籍月宝大和尚在鹿野苑 (Sarnath) 和拘尸那迦建造缅甸寺院^③。

^①Chowdhury, Hemendu Baksh (Ed.). *Hundred Years of the Buddha Dharmankura Sabha 1892-1992*. Calcutta: Buddha Dharmankura Sabha, 1990:1-7

^②Sumedha Thero, Kahawatte. *Anagarika Dharmapala: The Great Buddhist Revivalist*. Sarnath, Varanasi: Kahawatte Siri Sumedha Thero, 2009:11

^③Sumedha Thero, Kahawatte. *Anagarika Dharmapala: The Great Buddhist Revivalist*. Sarnath, Varanasi: Kahawatte Siri Sumedha Thero, 2009:11

1903年，拘帕萨罗难法师在加尔各答建造“法芽寺”（Dharmānkura Vihāra）；然后相继在1913年在诺帕罗（Noapara）、1921年在尤尼普那、1921年在吉大港丘陵（Chittagong Hills）的朗格玛帝（Rangamati）建造佛寺。

公元1906年，南印度不可接触的贱民阶级的领导者达斯（Pandita Ayodhya Das）在清奈的培朗布尔（Perambur）建立寺院。

在达摩波罗法师（Anagarika Dharmapala）的领导下，印度摩诃菩提协会在印度从事各种活动来复兴佛教。协会于1920年在加尔各答完成“法王精舍”（Sri Dharmarajikā Caitya Vihāra）的建造；并于1931年，在鹿野苑建造“根本香室精舍”（Mūlagandhakutī Vihāra）。

1925年，觉乐法师在勒克瑙的利萨德尔公园（Risaldar Park）成立“佛陀寺”（Bauddha Vihāra）。另外，他也成立图书馆，为大众提供佛学研究资料，并鼓励大众从事佛教研究。

印度西部的佛教复兴活动则是由两位杰出人物——耐尔博士（Dr. Anand Rao L. Nair）和乔赏弥法师（Bhikkhu Dhammanand Kosambi）领导：耐尔博士于1922年在孟买成立“佛陀学会”（Buddha Society）、于1931年在孟买成立“法喜寺”（Anand Vihāra）。乔赏弥法师于1937年在孟买的帕瑞尔（Parel）建造了“佛陀寺”（Buddha Vihāra）。

3.3 学术研究的开展

随着古印度文献和遗迹的发现与挖掘，以及西方学者对于印度学的研究，深深激励了印度学者，唤起他们对于古印度文化遗产的关注。由于加尔各答是现代印度初期的首都，也是学术活动中心，那儿的知识分子非常积极从事印度过去辉煌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这不但加速了佛教在印度的复兴，也促使佛教学术研究的开展。

密特拉（Rajendralal Mitra, 1824—1891）、达斯（Saratchandra Das）和夏斯特里（Haraprasad Shastri）是现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引领者，他们开启了印度对佛教文献研究的大门。密特拉在1877年发表了著作《菩提伽耶——释迦圣人的遗产》（Buddha Gaya: The Heritage of the Satya Sage）。他也和夏斯特里一起搜集了尼泊尔许多图书馆馆藏的手稿，并在1882年出版了他们的搜集成果，书名为《尼泊尔的佛教梵文文献》（*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另外，他也在1887年发表了《佛说普曜经》（*Lalitvistara*）。达斯访问过西藏，从西藏的佛教寺院收集了许多佛教材料。他在1882年回到印度后，把他的旅途见闻刊登在《佛教文献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Buddhist Text Society*）上。当他在西藏时，他为在西藏弘法的印度学者们，包括寂护（Śāntarakṣita）、莲花戒（Kamalaśīla）、燃灯（Dīpaṅkara）和阿提沙（Atiśa）等授过课，授课内容后来集结出版，书名为《在雪域的印度智者》（*Indian Paṇḍitas in the Land of Snow*）。达斯与维亚釜山（Hari Mohan Vidyabhussan）合作，从1888年开始分集出版克薛门特罗（Kṣemendra）的《譬喻集》（*Avadānakalpalatā*），最后一本在1918年出版。这些文献对于古印度佛教研究具有指标性的引领。

公元 1892 年，现代印度见证了三件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一件就是为了加强佛教基础研究的需求，达斯和夏斯特在加尔各答成立了一所佛教文献研究机构——孟加拉佛教文献学会（Bengal Buddhist Text Society）。学会的宗旨是培养历史、哲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独立研究学者。学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公元十三世纪毘提诃（Vedeha）以摩揭陀语（Magadhi）所写的《瑟曼得峰赞语》（*Samantakūta Vaṅṅānā*）翻译成梵语。这部诗主要描述佛陀的许多超凡事件和对斯里兰卡的描写。学会承接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辑和出版梵文的《宝鬘》（*Ratnamālā*）。这本书是一部古印度的民间传说，内容是关于阿育王和他的精神导师优婆掘（Upagupta）的对话，这个学会也资助《印度佛教文献学会期刊》（*Journal of Buddhist Text Society of India*）的发行。期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达斯编辑，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的研究；第二部分则是由巴哈度尔（Maharaja Kumar Binoy Krishna Dev Bahadur）和达塔（Hirendra Dutta）编辑，专攻梵语和摩揭陀语文学的研究。另外，学会也举办每周的摩揭陀语和藏语教学、出版许多梵文佛经和翻译，以及安排加尔各答梵语学院（Sanskrit College of Calcutta）的佛教课程。

第二件重要大事是把印度摩诃菩提协会把它的办公室从菩提伽耶迁至加尔各答，原因是这个协会需要寻求学术研究的资深机构——印度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India）的协助，从事古印度传说的相关研究。摩诃菩提协会也自 1892 年 5 月发行《摩诃菩提》（*Maha Bodhi*）期刊，并且把期刊视作协会正式运作的开始，以及让期刊作为其它佛教国家和菩提伽耶的交流媒介。

公元 1892 年发生的第三件大事是“孟加拉佛教协会”的成立。拘帕萨罗难法师，这位出于传统佛教世家的比丘，在 1885 年剃度后来到加尔各答。他把居住在孟加拉的佛教家庭组织起来，成立这个佛教协会。

除了许多学术机构的成立，在学术研究方面，维亚釜山（Satish Chandra Vidyabhusana）、夏斯特里、乔赏弥法师、罗怙罗法师、俱萨阎衍法师和伽尸耶琶法师等最为杰出。

维亚釜山是达斯的杰出弟子，原本擅长于印度逻辑，受到达斯的影响，开始研究佛教，专攻藏传佛教。他协助达斯编写藏英词典（1889—1899）和补充梵文同义词。在编写的同时，他也开始学习佛教另一重要语言——巴利语。1901 年，他获得巴利语硕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此学位的印度人。

公元 1901 年，维亚釜山出版《迦旃延的巴利语语法》（*Kaccāyana's Pali Grammar*），这本书是以天城体书写，并且包括英语翻译。他在 1907 年出版部分的《楞伽经》（*Laṅkāvatāra Sūtra*），然后隔年出版《佛赞摄》（*Buddha Stotra-Samgraha*）。1910 年，他去斯里兰卡的智增学院进修，接受苏曼伽罗大和尚（Mahathera Sumaṅgala）的指导。回到印度之后，他被聘为加尔各答梵语学院的校长。他在 1917 年出版《正理滴论》（*Nyāyabindu*），着重于大乘佛教哲学和逻辑。他也在 1922 年写了《印度逻辑史》（*The History of Indian Logic*）。这两部书在佛教逻辑研究范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夏斯特里在 1906 年发现由一群尼泊尔的悉多（Buddhist Siddhas）所著的歌曲和颂偈。十年

之后，他以合集的形式出版，书名为《佛教颂偈》(*Bauddha Gāna 0 Dohā*)。

随着现代印度的佛教复兴，人们渐渐明白学习巴利语来了解巴利三藏文献的重要性。20世纪初，乔赏弥法师带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乔赏弥法师在出家前，在浦那(Poona)和瓦拉纳西(Varanasi)学习梵语。在瓦拉纳西学了一年半之后，到了尼泊尔追寻佛教。然而，他对那儿的佛教感到失望，不久后就回到了印度，之后，他去到菩提伽耶朝圣，在听从那儿的僧人的建议之后，于1902年到斯里兰卡科伦坡的智增学院进修，向苏曼伽罗比丘学习巴利语和佛教思想，并在那儿受戒成为比丘。学成之后，他去缅甸学习佛教禅坐，1906年回到印度。同年年底，乔赏弥法师被聘为加尔各答大学的巴利语教授，成为第一位教授巴利语的印度人。在总统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德教授(Sri Harinath De)的协助下，两年之后，乔赏弥法师在加尔各答大学开设了预科到硕士学位的巴利语课程。

乔赏弥法师致力于巴利语和佛教的推广，成功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古吉拉特邦(Gujrat)的学者。在与班达伽博士(Dr. Bhandarkar)的合作之下，他在孟买大学开设巴利语课程。1912年，他被聘为浦那弗格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的巴利语教授。他也在印度国父甘地(Mahatma Gandhi)所设立的古吉拉特大学(University of Gujarat)服务过。因为他的努力，巴利语和佛教研究在印度西部受到欢迎。

为了服务印度读者，乔赏弥法师是第一位决定以天城体出版巴利文献的人。1914—1916年，他与他的学生拉吉瓦德(C. V. Rajwade)出版了《巴利语读本》(*Pali Reader*)。之后，他在1940年以天城体出版觉音(Buddhaghosa)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并以天城体写了《清净道论注》(*Visuddhimagga Dīpikā*)。他也出版了《摄阿毘达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ṅgaho*)和注释《新醍醐疏》(*Navanīta Tikā*)的天城体版。

许多印度学者以印度语言出版巴利文献，其中又以罗怙罗法师、俱萨阎衍法师和伽尸耶琶法师最为重要：罗怙罗法师从西藏带回许多原本在印度遗失的梵文文献；俱萨阎衍法师写了一些受欢迎的文章来宣扬佛教；伽尸耶琶法师则全心努力出版天城体的巴利三藏。这三位僧人不仅让佛教文献再度以它们原来的巴利语呈现，他们也把佛教文献翻译成其它不同的印度语。

透过上述学者们的努力，佛教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以巴利语为主的佛教学术研究渐渐地发展起来，梵文佛教研究也随后跟进。当时，位于比哈尔首都巴特那(Patna)的比哈尔研究协会(Bihar Research Society)、贾斯瓦研究院(K. P. Jaiswal Research Institute)，和达尔彭加(Darbhanga)的弥提罗学院(Mithila Institute)都出版过一些梵文佛教文献。

因此，十九世纪末十年和二十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印度见证了为佛教复兴而开展的学术研究。

3.4 社会觉醒运动

种姓制度自印度古代就非常盛行。这个制度将社会分为高、低两等级，并把不可碰触的贱民

种姓视为低等阶级。在印度历史中，第一位站出来反对和挑战这种社会普遍存在而僵化的种姓制度，就是西元前六世纪的佛陀。在当时，贱民不但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也没有任何社会尊严。佛陀允许他们加入佛教僧团，并平等地对待他们，因此佛陀所创建的佛教社会提供了皈依三宝的信徒一个安全、平等、尊严和正义的环境。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现代印度，种姓制度仍然是社会的主流，贱民种姓如同古印度一样被社会轻贱。安贝德卡博士意识到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只能从废除种姓制度着手，然后再提升贱民的信心。于是，他选择了视一切众生平等的佛教作为改革社会思想的利器。为此，他于公元 1955 年创立“印度佛教协会”（Bhāratīya Bauddha Mahāsabhā）。

印度在 1956 年庆祝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在同年的 10 月 14 日，安贝德卡博士为贱民举办佛教皈依大会，他和他的 3,8000 位追随者一同皈依佛教。虽然，这个大会开启现代印度佛教史的新一页，但是安贝德卡皈依佛教的最终理想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是想要改变整个社会，让他的追随者从不可碰触、不平等和被轻视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当安贝德卡博士的追随者跟随他的理想而沉迷于贱民群体皈依的活动时，不幸的是，安贝德卡在皈依大典七周之后，也就是 1956 年 12 月 6 日不幸逝世。他的过世和短暂地领导社会改革，对佛教复兴和印度社会是巨大的损失。虽然，他以佛教作为社会改革的利器，然而改革运动最终只活动于印度西部区域，无法推展到全国，这主要牵涉到两个政治问题：（一）改革运动无法脱离政治目的：虽然安贝德卡的改革运动聚焦于印度教的社会最底层教徒，但是他们大部分是文盲，无法积极参与。加上改革运动关注许多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最后无法脱离政治因素，以至于最后领导权落在政客的手中。（二）改革运动被政客利用：这个社会改革运动虽然被视为是好的开始，但是最终却被政客们用于满足个人政治目的，而不是让贱民脱离种姓制度的压迫。佛教，这个被安贝德卡博士视为可以改变社会和个人信心的重要来源，反而变为次要的。因此，改革运动失去了它的本质。最后，这一个新佛教运动无法展开成全国性的社会改革运动，只活跃于印度西部。

虽然安贝德卡博士只做了七周的佛教徒，但是他对宣扬佛教和提升贱民的自觉意识做了最大的贡献。他的皈依震撼了全印度，也同时唤醒了贱民。当前的新印度佛教徒除了对抗贫穷、缺乏教育和社会资源之外，他们正积极努力地学习佛法和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他们相继在许多地方建造寺庙、禅修中心，以及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并以古代佛陀的教导为依据，从事自我成长和实践安贝德卡博士公正社会的愿景。

3.5 教育机构的成立

为了提升印度大众对佛教的认知，以及增加佛教学习的材料，许多佛教僧侣和印度政府开始成立佛教教育机构。公元 1936 年，印度的罗枯罗、俱萨闍衍、伽尸耶瑟等三位僧侣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订定他们的巴利语和佛教推广的最终计划时，其中的伽尸耶瑟法师决定献身于

佛教教学、研究，和成立教育机构。通过他的积极努力，他于 1940 至 1941 年在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设立巴利语课程，也在同校的梵语系和哲学系教授巴利语硕士课程和佛教逻辑。

伽尸耶琶法师最重要的贡献是成立新那烂陀寺(Nava Nālandā Mahāvihāra)。他受到古代那烂陀寺过去辉煌历史的影响，想要让那烂陀寺再度成为国际性的佛教研究中心，因而决定承担重建那烂陀寺的光荣任务。为此，他把个人活动地点从瓦拉纳西移到那烂陀。1951 年新那烂陀寺完成，逐渐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巴利语和佛教中心。伽尸耶琶法师正是此重要教育机构的创建人和负责人。

当伽尸耶琶法师留在瓦拉纳西出版天城体的巴利三藏时，他也在瓦拉纳西梵语大学（Vāraṇaseya Sanskrit University, 现为 Sampurnānanda Sanskrit University）教巴利语。他随后于 1959 年成为这所大学的首任巴利语系教授和系主任，直到 1965 年回到那烂陀为止。因为他的关系，这所大学设有沙门学院(Śramaṇa Vidyā Saṅkāya)，学院有两个系所——巴利语佛教系、佛教哲学系。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开始关注佛教研究，并且成立佛教学术机构。印度第一任总统普拉萨德博士（Dr. Rajendra Prasad）、第一任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Dr. S. Radhakrishnan）和第一任总理尼赫鲁（Pt. Jawaharlal Nehru）都意识到佛教对于古印度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贡献，以及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公元 1956 年佛陀诞辰二千五百年的一个纪念活动场合中，印度政府决定全年庆祝。随之，印度总统普拉萨德博士立即宣布在德里大学设立佛教研究系所。次年，也就是 1957 年，德里大学成立佛学系，聘请巴利语和佛学研究权威巴帕特（Prof. Bapat）为教授，负责部门运作和推动佛教研究。

在佛陀成道的比哈尔邦有两所大学设有巴利语和佛学课程：一所是位于菩提伽耶的摩羯陀大学（Magadh University），这所大学在 1983 年设立佛学系和巴利语课程；另一所帕戈尔布尔大学（Bhagalpur University）开设巴利语课程。

在北方邦的戈勒克布尔大学（Gorakhpur University）、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阿里格尔大学（Aligarh University）等提供巴利语教学。

在印度北部帕蒂亚拉（Patiyala）的旁遮普大学（Punjabi University）的宗教研究系设有佛学课程；昌迪加尔（Chandigarh）的旁遮普大学的汉语和藏语系有安排佛学的证书和学分课程；哈里亚那邦（Haryana）的古鲁格舍德拉大学（Kurukshetra University）设有梵语、巴利语和帕罗克语（Prakrit）课程；喜马偕尔邦大学（Himachal Pradesh University）有佛教研究中心，中心开设藏语学分课程。

位于印度西部的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的古吉拉特大学（Gujarat University）设有巴利语和帕罗克语学系，其附属的 M. D.学院设有佛学系。

从古至今，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就致力于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位于这个邦的阿

洛拉(Alora)、阿旃陀(Ajanta)、坎赫里(Kankeri)、纳西克(Nasik)、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帕伽(Bhaja)、卡乐(Karle)、贝德萨(Bedsa)、空特内(Kondhne)、巴格(Bagh)、毗塔克罗(Pitalkhora)等地拥有世界著名的石窟、石窟寺、支提(caityas)、石窟艺术和画像等文化遗产,遗产中涵括许多佛教遗迹,让马哈拉施特拉邦成为著名的佛教名胜之地。在佛教复兴过程中,这个邦也做出许多伟大的贡献,其中又以乔赏弥法师和安贝德卡博士最为重要,他们的贡献已经在前面提过。在教育方面,浦那有一个悠远的巴利语和佛教研究学者世系,包括乔赏弥法师、巴帕特教授、拉吉瓦德、钵提克尔(R. D. Vadeker)、瞿坎利(V. V. Gokhale)、阍修(C. V. Joshi)等。在学术教育机构方面,马哈拉施特拉邦大学(University of Maharashtra)提供巴利语本科和硕士课程。浦那大学(Pune University)有两个单位从事佛教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一是巴利语和佛学系,另一个则是佛教研究和安贝德卡思想中心。那格浦尔大学(Nagpur University)和亚玛拉哇地大学(Amaravati 大学)提供巴利语和帕罗克语系。奥兰加巴德的安贝德卡大学(Dr. Baba Saheb Ambedkar Marathwada University)设有巴利语与佛学系,以及佛教研究中心。贾尔冈(Jalgaon)的北马哈拉施特拉大学(North Maharashtra University)、孟买大学(Mumbai University)和安贝德卡博士所创立的悉达多学院(Siddhartha College)也都安排巴利语本科课程。索迈耶佛教研究中心(K. J. Somaiya Center)于1993年创建,主要从事佛教教学。

南印度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有极丰富的佛教传统,也曾拥有过辉煌的佛教历史。许多佛教著名的导师,像龙树菩萨(Nāgārjuna)、提婆菩萨(Āryadeva)、陈那(Dinnāga)、清辨(Bhāvaviveka)、法称(Dharmakīrti)等皆来自此邦。当时的外交部长那罗希摩·饶(P. V. Narsimha Rao)为了复兴此邦曾有过的佛教历史,在穆迪教授(K. Satchidanand Murthy)的建议下,于1981年通过一个法案,决定成立一所研究佛教全面的研究中心。公元1982年3月,安得拉邦贡土尔(Guntur)的龙树城(Nagarjuna Nagar)的龙树菩萨大学(Acarya Nagarjuna University)设置大乘佛教研究中心,目前正努力朝向高级研究机构发展。

印度东部和东北部有几座大学提供巴利语和佛学课程: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国际大学(Visvabharti Santiniketan)设有梵语、巴利语和帕罗克语系。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 University)有印度最先成立的巴利语系。阿加尔塔拉(Agartala)的塔库尔学院(Ram Thakur)等一些学校也提供巴利语本科课程。

摩诃菩提协会从印度的佛教复兴和佛教研究一开始,就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它在印度各地设有许多分支机构,从事宣扬佛教、促进佛教研究,以及出版书籍和期刊等活动。

目前,印度政府和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正努力唤醒大众对佛教研究的热忱,因而设置许多奖励办法。为了促进佛教发展,印度文化部对佛教和藏族组织机构提供财务补助,资助他们从事佛教活动和保存相关文物。另外,人力资源发展部设有总统荣誉奖,用于鼓励杰出的印度古典语言学者,巴利语为其中之一。我与有荣焉地宣布,我所服务的巴拿勒斯大学已有四名校友荣获这个国家的最高荣誉。

大学资助委员会曾批准过许多大学和学院成立佛教研究中心，并补助过许多佛教和佛教相关研究的研讨会、会议、座谈会、研习会和课程。另外，为了促进佛教研究，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Cultural Relations）一直在南亚、东南亚及东亚佛教国家举办会议和研讨会。

印度在第二十二世纪初就已经了解到研究中国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加尔各答大学在1918年率先设置汉语和文学课程，并把这个课程列为印度历史和文化硕士课程的一部分。但由于缺乏中国语言专家，课程难以持续。公元1924年，印度伟大的学者、诗人，也是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访问中国。他观察到中华文化受到佛教极深的影响，他也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放斗争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在国际大学设立了研究中国系，专门研究中国政治与文化等议题，同时也开设中国佛教课程，邀请勒维教授（Prof. Sylvan Levi）为客座讲师。公元1937年，泰戈尔聘请中国学者谭云山到国际大学成立中国研究中心。经由谭教授的努力，印度有了第一所专门从事中国佛教与中印关系研究的学院——中国学院。谭教授也请著名学者巴格奇（P.C. Bagchi）协助他健全系所的运作。在这两个学者的领导下，中国学院成为中国佛学和中国研究专家的培育温床。学者如罗摩南（V. Ramanan）、穆克吉（B. D. Mukherjee）、孙（N. C. Sen）、冉云华（Ran Yunhua）、普拉丹（Prahlad Pradhan）、穆克吉（P. K. Mukherjee）、巴宙（W. Pachow）、泰戈尔（Amitendra Nath Tagore）等皆从此中心毕业。

另一座规模较小的中国研究中心设立在浦那的弗格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该中心也从事中国佛学研究和翻译。巴帕特教授、高卡尔教授（V. V. Gokhale）等来自此中心。

印度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成立两所中心从事中国研究：第一所是附属新德里印度国际研究学校（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东亚研究部门；第二所是附属德里大学佛教学系的中国和日本研究中心。然而，这两所中心都主要关注于现代汉语研究，忽视中国佛教研究。之后，印度国际研究学校并入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并入后专注于东亚研究，并以此闻名。尼赫鲁大学另外也成立当代汉语和文学研究学系，但是该系没有提供古代汉语文学和佛教相关的课程。

德里大学的中国和日本研究中心分为中国和日本研究部和佛学部。前者着重于现代汉语和区域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汉传佛教和中印佛教交流的研究。此中心由巴帕特教授、高卡尔教授两人成立，他们为此，还特地从浦那搬迁到德里。拉哈里教授（Latika Lahari）和寂静法师（Shanti Bhikku Sastri）为继任的中心负责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成立两所小规模的教育机构，一所是在巴拿勒斯大学，另一所是在昌迪加尔的旁遮普大学。这两所机构一开始都是开设现代汉语的学分班和证书课程，后来才扩大到学位课程。巴拿勒斯大学的现代汉语附属外语系，由文学学院院长纳里扬教授（Prof. A. K. Narian）成立，然后在薛雷教授（Prof. Xuelei）和卡马尔教授（Prof. Kamal Sheel）的领导下，设置硕士和博士课程。昌迪加尔的旁遮普大学所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属于中亚研究部门的下属单位。本中心着重于中国及喜马拉雅地区的区域研究。

现在印度有许多大学已经设置汉语课程，主要教授现代汉语。

目前印度文化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和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Indira Gandhi Centre for National Arts）正在进行佛教和印度文学、文化、中印交流范畴中关于中国和蒙古原始手稿的研究。

我个人认为，比起印度其它学派，巴利语与小乘佛教研究在印度佛教研究中，发展更快、更兴盛。

3.6 内观禅修的复兴

随着葛印卡大师（Saty Narayan Goenka）的努力，佛教内观禅修风靡于印度。他在伊格德布里（Igatpuri）成立的禅修研究所，提供普通和学者程度的内观课程。许多政府和私营机构因为看到内观禅修可以增进员工身心的健康，也为他们的雇员安排课程。当然，内观禅修主要盛行在精英和中产阶级。为了推广佛教，葛印卡大师的禅修研究所也出版天城体的佛教三藏，以及缅甸文的注释、复注与补注。

4. 佛教与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系统与过去几个世纪的系统完全不同，现代所谓的正规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一种生意。今日，学生们为了金钱利益、社会地位，和获得一份好工作而接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增加人文精神知识或道德素养而到学校学习。加上资本主义已经改变整个社会品味，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教育目的、方式和机构和过去相比，人们更重视职业能力的培养，而非人文精神的提升。这是因为工业化创造了更多的职业领域，这些领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的培养则迫使教育制度的改变，当然也改变了大众对于教育的看法。在古代，教育关注的是人文精神的学习，但在后工业革命的今日，教育关注的是科学和职业技术训练，所以现代教育系统不再是以人文为核心了。

毫无疑问，当今所谓的正规教育已经成为生活保障的手段。为了保障物质生活的质量，人们必须透过学校和工作场所提供的课程和职业培训来精进工作相关的技能。再者，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人们必须要更加努力、要花更多的时间学习工作相关知识，没有多余时间从事人文和精神方面的学习。总之，现代教育已经只是一个获取职业技能的过程和手段，而不再是一个提升人文精神的学习中心。

然而，古印度人主张教育是个人的修养和自我进步的一种过程，并认为这个过程直到生命结束才停止。教育是内在精神之光的来源，指引人们看见自己的内心，然后改变自我个性。相反的，现代教育是指机构的教学、指导和训练。虽然提供充分的学术知识、技术和生存手段，但也造成个人和社会道德价值的低落。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提升个人和社会道德素养，教育机构极需结合相关的课程，而佛教则是最合适的选择。它不仅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它最终更能

够让人们从世界的轮回中获得解脱。

参考文献

- Ahir, D.C. The Pioneers of Buddhist Revival in India [M].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9.
- Chowdhury, Hemendu Baksh (Ed.). Hundred Years of the Buddha Dharmankura Sabha 1892-1992 [M]. Calcutta: Buddha Dharmankura Sabha, 1992.
- Kashyap, Bhikkhu Jagdish (Ed). Dhammapada [M]. Nālandā-Devanāgarī-Pāli-Series, 1959.
- Kashyap, Bhikkhu Jagdish (Ed.). Dīgha Nikāya [M]. Nālandā-Devanāgarī-Pāli-Series, 1958.
- Kashyap, Bhikkhu Jagdish (Ed.). Samyutta Nikāya [M]. Nālandā-Devanāgarī-Pāli-Series, 1959.
- Kashyap, Bhikkhu Jagdish. “Buddhist Revival in India” The In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J]:1996: 8; Narain, A.K. and Lalji ‘Shravak’ (Eds), Bhikkhu Jagdish Kassapa (BJK) Institute of Buddhist and Asian Studies, Varanasi, India.
- Narain, A.K. and Ahir, D.C. Dr. Ambedkar, Buddhism and Social Change [M].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4.
- Narain, A.K. and Lalji ‘Shravak’ (Eds). The In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J]. BJK Institute of Buddhist and Asian Studies, Varanasi, India.
- Sumedha Thero, Kahawatte. Anagarika Dharmapala: The Great Buddhist Revivalist[M]. Sarnath, Varanasi: Kahawatte Siri Sumedha Thero, 2009.

(翻译: 吴承庭)